

告別「工具」

——讀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沉浮》

◎ 陳建華

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沉浮》（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在汗牛充棟的談論中國知識份子的著作中，最近面世的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沉浮》一書（以下簡稱《沉浮》）無疑將成為這一方面研究的經典之作，因為它寫得實在——材料詳實、立論平實、功底扎實。此書主要論述從50到80年代的上海知識份子群體，如何在中國走向「全能主義政治」期間逐步淪為「工具化」的歷史演變過程。集中探討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專著本來就很少見，少見首先是由於從事這樣的研究有相當的難度，其難度在一般情況下是難以克服的。

此書主要分三個階段展開，即從1949至1957年為「全能主義政治的形成」、1958至1976年為「全能主義政治的確立」、1976至1989年為「知識份子去工具化」時期。在既有系統又突出各階段重點的分析中，圍繞典型事件和傳媒人物，如「反右」運動中的「文匯報」、「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市委寫作組及鄧小平時代的「世界經濟導報」等，對於具代表意義的知識份子作了大量的採訪工作，這些珍貴的口述資料為歷史提供見證，亦體現了此書的社會史個案研究的獨特之處。

將上海作為觀察現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命運的窗口，確屬明智的選擇，卻伴隨著挑戰。上海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埠以來，無論對民族國家及其現代文化的建構都舉足輕重，而其歷史與文化的複雜性則萬花筒般令人眼花撩亂。作者精練而概括地描述了民國時期上海的「現代化進程」，在列強並存、五方雜處的歷史條件下，出現某種「創新、開放、多元、崇實」的「洋場」文化。儘管自二十年代末這一「現代化進程」遭到挫折，但知識份子自由、獨立的身份和傳統并未完全喪失，他們對國民黨專政的抵制充份表明這一點。

共產黨進入大上海之後，迅速而全面地進行了社會整頓。取締妓女、打擊奸商、鎮壓黑社會等措施，包括解放軍不犯秋毫、露宿街頭等，確實樹立了「人民政府」的新形像，不光老百姓箪食壺漿，對於盼望統一、痛恨國民黨腐敗的知識份子來說，道德上似乎得到很大的滿足。但事實上正如此書所強調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從一開始即具「全能主義政治」性質，已把矛頭指向「民間社會與公共領域」。解放軍進城伊始，就關閉了《申報》、《新聞報》等，下令停辦一切新聞機構，其實是封殺言論和出版自由，已見先兆。由於接二連三的大規模清洗和鎮壓運動，全社會瀰漫著恐怖氣氛，而在思想領域裏也馬不停蹄，從批判電影《武訓傳》到批判胡適、俞平伯，尤其是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對上海知識界的打擊更為直接。經歷這幾場「思想改造運動」之後，知識份子已成甕中之鱉、驚弓之鳥，更通過「自我

批評」這一史無前例的模式，所謂知識尊嚴和獨立人格都已喪失殆盡。

在分別描述這些思想運動時，我覺得更精彩的是，作者更深入到「全能主義政治」得以形成的機制內部，即細緻勾畫整個社會空間被化「私」為「公」，從工商界實行「公私合營」、國有企業「單位」組織到街道居民委員會、戶口制度的建立等，黨和國家力量控制了社會和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對於知識份子來說，經歷了1957年反右鬥爭之後，處於一種完全受控制的「生存環境」，無論在戶口、就業、待遇等方面，都徹底依附於「單位」。精神上失去獨立和自由與物質上的限制是一致的。且事實上「身」不由己，動輒得咎。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是毛澤東有關知識份子的名言：「知識份子從舊社會出來，就是吃五張皮的飯。過去知識份子的毛是附在五張皮上面：帝國主義所有制、封建主義所有制、官僚資本主義所有制、還有民族資本主義所有制、小生產所有制。」按照這種理解，所謂「知識」也是換得吃飯之具，所以「皮」和「毛」的比喻表明一種雇佣關係。對知識份子實行「改造」，無非要他們明白在新社會是「無產階級」賜於他們飯吃。在這方面毛的邏輯其實同資產階級沒有根本區別，富於反諷的是從前是「五張皮」，知識份子還有選擇的餘地，現在只有一張皮，而且吃的是「嗟來之食」！

在「徹底唯物主義者」毛澤東那裏，知識份子是被徹底「物化」的，其中已蘊含著「工具」論，這和他另一方面極端強調精神力量並不矛盾，即知識份子在思想上無條件接受「馬列主義」，即所謂「毛話語」。正如書中敘述的，在1958到1976年之間知識份子成為政治工具，隨著舊時代自由主義傳統被掃蕩殆盡，新中國培養出自己的知識份子，佔領了文化舞台。在上海像柯慶施、張春橋、姚文元等即為代表。他們為「毛文體」所「內化」。典型的如上海市委寫作組，是當時「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鋒、方向標，其使用「羅思鼎」這一筆名，意謂在黨的輿論機器中發揮一顆「螺絲釘」的作用，即把知識份子的「工具」性質表現得淋漓盡致。此時知識份子千人一面，萬馬齊喑，實即淪為毛字號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沉浮》具有一種嚴謹而規範的學術風格。作者先是就讀於美國加大洛杉磯分校，師從「新左派」代表人物派瑞·安德森，深研西方各家知識份子理論。後來在香港大學攻讀社會學，師從金耀基先生。如此書所體現的，歷史感與社會學方法——系統分析、個案研究、實地採訪——揉為一體。在「文獻評述」一節中，我們可看到作者在充份掌握現有文獻的基礎上，博採眾說，卻不盲從某些權威論述或西方的分析模式。如作為全書論述支點的知識份子「工具」論，其實基於一個極其日常的政治文化現像，即雷鋒所說的，甘作一顆「小小螺絲釘」，「黨指向哪裏就到哪裏」。於是「螺絲釘」一語成為中國人的口頭禪，也是「羅思鼎」集體筆名的出處。但將知識份子「工具」論放到「全能主義政治」框架中作系統分析和詮釋時，卻揭示出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深層結構。所以說，此書不花哩胡哨炫耀理論，也不故作驚人之論，研究以切合中國實情為指歸，而足然成一家之言。

有關現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論述大多側重其思想流變與特徵，《沉浮》則別開生面，揭示其生存環境即物質條件的層面。這體現了作者對於人的主體和客觀環境之間的關係方面作了合理的處理。同樣的，書中一方面探討知識份子如何被一步步走向「工具化」，另一方面論述他們如何「抗拒工具化」，這在第四章中作了充份的表述。儘管被「改造」而「物化」，但知識份子當中仍有錚錚骨鯁在，如儲安平、賈植芳等，正所謂大浪淘盡，天壤間終有良知不泯，精神亦終有其超越之價值，此中有深意存焉。另可注意的是，在歷史與現實的關係方面也作了較好的處理，即在探討某種文化現像時，時時追溯其歷史的聯結。如對於1949年之前上海文化及知識份子傳統的描述，或對於中共的「工具化」政策則源自於30年代的上海「左

翼」組織至延安「整風」運動，這些都作了專節討論。尤其在第四章，「反右」運動中上海《文匯報》被毛澤東點名，遂遭滅頂之災，而作者追述其「文人辦報傳統」，即徐鑄成等自由辦報由來已久，早已被視作眼中釘。這樣清楚交代其來龍去脈，如果沒有一種求實研究的態度，大約是很難做到的。

不得不表出的是，在收集和運用資料方面，足見此書之長。且不說中外理論文獻、公私函牘部份，涵蓋面殊廣。大量數據得自於陳年報刊的細心爬梳，而八十年代以來許多回憶錄等，甚至包括文革時期上海「地下詩」情況，則來自於海外發表的渠道。通過回憶材料的大量使用，使許多事件的真相見之於世。如在「胡風事件」中，由賈植芳、任敏的回憶材料得知，他們夫婦倆被突然逮捕，投入獄中，從此整整十二年，互相不知下落，不知生死。數十年之後讀來，心頭猶為之震顫，若能想見當時生死兩茫茫，豈能惘然！

無論反胡風、反右，乃至文革，人民共和國「繼續革命」的歷史，由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所構成，但除了紅頭文件、官方報道之外，我們能知多少？這類已見世的回憶僅露出冰山一角而已。如果歷史真相尚存活於記憶之中，然而時過晶遷，時不我予，至今所能存活的尚有多少？從這個意義上《浮沉》的作者以極大的熱誠投入了打撈記憶的工作，如對於反右時期《文匯報》編輯部、文革中上海市委寫作組及1989年《世界經濟導報》編輯部這三個群體作了採訪。他們代表知識份子的不同命運，而在接受採訪時，則同樣面對90年代中國全球化的新局面，因此在撫今追昔中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歷史的覺醒和反思。這也是此書最具價值之處。

有意思的是，在80年代「解凍」時期，作者擔任上海市委宣傳部思想研究室主任，密切參與體制改革，而書中有關《世界經濟導報》的章節，其實有他自己的影子。因此對於「八九」，自然是絕難忘卻，其自身的遭遇也隨之顛簸，但在敘述「風口浪尖上的《導報》」及欽本立、張偉國等人在八九之後的厄運時，卻顯得出奇的冷靜。跟全書的體例相一致，作者始終訴諸事實，尊重歷史，既體現其基本的價值判斷，而與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界線分明。同樣的對於《導報》知識份子群體也作出客觀的歷史定位：他們屬體制內改革派，「盡量在體制規範內行事，但不是被動地服從」，他們的「獨立自主意識和批判精神在逐漸抬頭」，「反映了一種從工具知識份子到獨立知識份子的過渡形態」。

俗話說，溫故而知新，《浮沉》一書來得及時。自90年代以來，中國發生巨變，尤其對於知識份子來說，似乎迅速進入物質富裕、「意識形態終結」的時代。但事實上往事并非如煙，許多問題仍值得探討。此書所揭示的「全能主義政治」及知識份子「工具化」的歷史過程，是否在當下「全球化」進程中已屬過眼煙雲？儘管對此書的觀點可見仁見智，但如果「知識份子」仍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的話，那末對他們來說，了解自己的生存環境，思考歷史和現狀，或能從這本書獲益良多。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二期 2005年9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二期（2005年9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